

组织驱动宣传： 再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

史泽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发展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度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挑战面前,中共中央依靠组织驱动,通过组织遴选、工作领导、多组织配合及业务培训等方式,迅速建设起既能够覆盖全国,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宣传动员网络。宣传网的建设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细腻的宣传管理技艺。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宣传工作的同时,组织本身也实现了更新升级。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网;宣传工作;组织驱动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1)04-0031-12

DOI:10.14119/j.cnki.zgxb.2021.04.004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问题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1],但整体上看,研究进路主要局限于对宣传网建立、发展、运行与解体过程的具体论述。这些成果虽然已经勾勒出宣传网的大致轮廓,但却无力解答支撑起宣传网并推动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百万计的宣传大军,并依靠他们将宣传工作延伸至社会深处,逐渐掌握舆论主导权,根本上应归因于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与宣传间的互助效应。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组织工作同宣传工作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在1941年6月颇为形象地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2]实践中,中共也确实依靠组织工作推动了宣传工作的发展。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总结抗战以来

的宣传工作时强调:“由于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宣传工作展开了广大的领域。”^[3]事实上,以组织推动宣传较早便成为中共党内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然而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4]。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为例,深入审视中共如何将组织优势嵌入至宣传工作之中,迅速建立起既能够覆盖全国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宣传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宣传又给组织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

一、谣言四起:宣传网建设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为了向群众开展宣传,引导社会舆论,重点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通过建立党政宣传机关、出版报刊图书及兴办教育事业等方式,大幅扩充党的宣传力量。1949年初,毛泽东在给第二、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全军要通过整训,

[收稿日期] 2021-01-14; **[修回日期]** 2021-05-10

[作者简介] 史泽源,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做到“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宣传工作,进而为“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做好准备^[5]。解放军在接管城市乡村的过程中,严格遵照了上述指示。如陈云在总结接管沈阳的经验时提出:“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一进城就立即出报。”^[6]彭真在领导北平接管改造的过程中也重点强调:“训练一批政治教员或宣传员。”^[7]二是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收缴秘密电台,从源头上切断谣言。据1950年3月《人民日报》报道:“仅去年一年中我公安机关在上海、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济南、青岛、汉口、桂林、成都、太原、福州、迪化等大城市,破获蒋匪秘密电台达五十余部之多。”^[8]经由上述工作,中共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宣传工作系统,并总体上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

但当时全国宣传工作也存在缺陷。一是党政宣传机构有待健全,尤其缺乏专业宣传人才。直至1951年初,“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宣传部现在一般均只设宣传及教育二处”,“各省委及地委宣传部的干部大感缺乏。地委宣传部往往只有部长而无其他工作人员,西南及中南的有些地委且无宣传部长,县委宣传部更弱”^[9]。二是党员干部中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现象。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指出:“有不少党员干部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他们既不学习,也不宣传,错误的认为:‘不学习政治也可以工作’,‘不宣传也可以完成任务’”^[10]。三是中共掌握的宣传教育资源十分有限(详见表1),且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大行政区或省很少或几乎没有自己的出版力量”^[11]。加上当时“全国文盲半文盲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12],报纸及图书等文字宣传品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尤为微弱。在此之外,潜伏在各地的反革命势力,仍在伺机制造谣言,破坏新生政权。时任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于1950年3月召开的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上指出:“我们的首都北京,已经解放两年多了,北京还有没有反革命呢?还有。反革命活动怎样呢?反革命分子仍然很猖獗,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权,仍然常常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骚扰和破坏。”^[13]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时间

解决上述问题。突然而至的朝鲜战争,使中共在宣传工作上存在的不足被进一步放大。

表1 1951年国家掌握的主要宣传教育资源^[14]

	数量	占人口比例(每万人)
报纸	79752 份	1.47
图书	20000 册	0.37
在校小学生	2892.4 万人	533.98
文化馆	896 个	0.017

有关朝鲜战争的消息传至国内后,群众顿时感受到焦虑和恐慌。在城市,工人“情绪低落,影响了生产工作”^[15]。农村更是出现了地主“公开翻把”的现象^[16]。而谣言快速滋生是搅乱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因。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于1950年6月26日,首次播报了朝鲜战争的消息^[17]。若以此为界,《人民日报》上半年共有85篇报道涉及国内谣言问题,而下半年涉谣的国内报道则跃升至158条。1950年10月,中宣部发给各地的指示中亦提到:“现时农村城市谣言均甚猖獗。”^[18]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中共迅速采取了行动。1950年10月10日、2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这两大举措表明,此时中共中央在处理舆论问题时,仍沿袭先前的工作思路,即一方面依托干部及专业宣传工作者。如后一个文件中专门强调“本件应在干部和宣传工作人员中迅速详细传达”^[19]。另一方面则侧重于严厉打击反动势力及造谣活动。然而结果表明,上述举措的效果十分有限,并未达到彻底平息紧张社会局面的目的。1951年初,仍“有许多错误的和反动的宣传和谣言经常在人民群众中流传”^[20]。究其原因,除了反革命势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扫尽,仍在暗中继续散播谣言外,单方面依靠干部和专业宣传队伍,亦难使宣传工作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甚至部分基层干部由于在动员群众时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还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态势。如贫农“张鹏昆自头一次听了教员的报告后,心老是七上八下的,好几夜躺在炕头上翻来覆去的不能入睡,又是怕又是怒”^[21]。在邻近朝鲜的吉林省,还一

度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区干部打人的现象相当普遍,据在省委党训班了解,某县来的三十三名学员中,从抗美援朝运动以来,打人的就有二十二名,占三十三名的67%”^[22]。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损害了中共形象,激化了干群矛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应对措施。

早在1950年春季,东北地区的部分国营企业,已经在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通过从党团员及劳动模范中选拔宣传员的方式,扩充宣传力量。此后,华北、中南及华东地区也开始试验发展宣传员。其中东北地区宣传员规模最大,至1950年底已经有近12万宣传员活跃在东北城乡,且在宣传方针政策、破除谣言等方面收获了一定成效^[23]。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试办宣传网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建设全国性宣传网的决定。两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同于此前主要依托干部和专业力量宣传群众的工作思路,《决定》强调具备一定宣传能力的党员、团员及积极分子均可以自愿担任宣传员。至1951年底,全国已有超过580万名党员、约25万个党支部^[24]和518万名团员、24.2万个团支部^[25]。倘若这逾千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能够广泛参与宣传工作,势必在组织层面迅速提升中共的宣传能力。

二、组织遴选:宣传员的产生

宣传员是整个宣传网的主体。为了从党、团组织中选取能够担任宣传员的合适人选,《决定》对选拔标准、程序及方法作出了明确要求。此后中共中央又结合宣传网建设情况及现实环境,有针对性地调整与完善遴选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充分体现了组织的基层优势。

1951年初,中共中央明确了选拔宣传员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宣传员应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以身作则,联系群众,并有担任宣传工作的适当能力”^[26]。结合当时国内较为紧张

的舆论环境及迫切的战争动员需求,中共亟需政治上可靠的宣传员将其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因此,各地在执行宣传员选拔标准时,更加强调宣传能力和政治标准。如西北局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选拔宣传员时,“必须注意物色有适当宣传能力的与群众有联系有威信、政治上可靠的党团员担任”^[27]。上海市则强调,“首先从基层党员、团组织中,物色一部分符合于宣传员条件的党员、团员、干部为骨干”^[28]。这使得具有一定宣传工作经验的党、团员,率先被发展成为党的宣传员。1951年8月,据华北局宣传部统计:“宣传员中,以党员数量最多(约占半数以上),群众积极分子次之,团员再次之。”唐山市宣传员中党员占56%、团员占18%^[29]。中共在制定选拔标准的同时,还强调支部要担负起宣传员选拔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即“宣传员的任命应当经过党的支部委员会的审查通过和底一级党组织的批准”^[30]。宣传员的选拔过程,一般要经过支部委员会提名、党员大会讨论、向群众公示及由上级党委审核批准几个步骤。其中日常表现及工作能力,是支部提名宣传员的主要评判依据。如热河省规定:“凡有党支部的地方,选择觉悟高学习好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并且有适当的宣传能力的党员二人至三人为宣传员。”^[31]

实践证明,在初建宣传网时,由基层党组织主导遴选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部分地区在选拔宣传员时,采用了让群众直接投票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尽管基层党委反复向群众强调了担任宣传员的基本条件,但群众在投票时,经常将其抛于脑后,仍按照他们心目中关于宣传员的既有形象进行投票,且结果显示,群众更乐于把票投给过去在当地有一定威信且善于言辞的非中共人士。像在宁波市慈明德乡,工作干部在土改会上,向群众说明选拔宣传员的条件后,“当场即由群众选出十人担任宣传员,由于当时群众认为宣传员一定要‘讲得像样的’,‘嘴唇皮薄的’,因此,选出十人中,雇贫农仅四人,中农五人,小贩一人,有些是年纪大不积极的,实际能起作用的仅三人”^[32]。湖北南漳城区群众选出的宣传员“二分之一是旧人员”^[33]。中共中央在总结1951年度宣传员发展工作时也强调:“有的地方不注意宣传员的政治

条件,只注意文化水平,以至吸收了一些品质不好的甚至政治上很坏的人当宣传员;有的地方用由群众选举的方式去发展宣传员。”^[34]事实上,当时群众更愿意将选票投给士绅及富裕阶级是有其行动逻辑的。“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35]旧政权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在群众头脑中绘制了宣传者形象,而这种旧形象不仅能赢得群众手中的选票,还会屏蔽与阻碍中共的宣传信息。这也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势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依旧存在。倘若中共不依靠组织力量,对宣传工作加以干预,很难使方针政策传达至社会基层。

至1951年底,全国已发展了逾155万名宣传员,其中绝大多数宣传员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产生的。尽管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但相较于全国5亿的人口规模、近1100万的党团员人数,中共中央对此发展速度仍不够满意,并提出在1952年底,将宣传员发展至400万至500万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要把发展宣传员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结合中心工作建立和发展宣传员组织的具体办法是:各级党委在向下面布置中心工作,同时应布置关于这些中心工作的宣传工作,及在这些宣传工作中建立和发展宣传员组织的任务。”^[36]中共所以改用结合中心工作发展宣传员的办法,主要基于下述原因。一方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党团支部及积极分子中能力较为突出且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已经当选为宣传员。这使得基层党支部在不经实践考察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再向上级推荐合适人选。另一方面,一年来大量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与了党的宣传工作,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工作水平,进而为党选拔宣传员提供了重要参考。且结合中心工作选拔宣传员,确实在发展速度上更具优势。1952年底,宣传员规模迅速跃升至379万^[37],发展速度几乎是1951年的两倍。

1953年初,在朝鲜战局渐趋稳定,国内正式启动了“一五”计划的背景下,动员群众投身生产建设随之成为宣传工作的核心任务。中共在此后选拔宣传员的过程中,重点突出了生产能力标准。1953年初,

中共中央指出:“今后并应注意吸收一部分够宣传员条件的工业和农业的劳动模范、熟练的技术工人、有生产经验的农民以及技术人员充当党的宣传员。”^[38]次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亦强调:“今后发展宣传员应注意质量,并尽量先在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去建立,吸收品质好、有宣传能力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先进分子、劳动模范等担任宣传员。”^[39]由此可见,中共选拔宣传员的标准,具体取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和舆论环境。

为进一步完善宣传员队伍建设,中共还要求各地党委对宣传员实行工作考核,考核的主要方式是对宣传员实行年度测评。如1951年3月,吉林省要求各村已建立宣传员的支部,“在春耕前进行一次宣传员活动考核鉴定,分别表扬优秀的宣传员,整顿现有的宣传员组织,建立对宣传员领导训练使用的制度,不称职的应不参加当宣传员。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适当的发展”^[40]。考核结果一般按工作成绩,从高至低将宣传员分为三类。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发扬先进宣传经验的基础上,督促二、三类宣传员向一类宣传员学习。对于业务水平较差,在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宣传员,则要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调整与撤换。如华东局曾就整顿宣传网工作作出如下要求:“对其中宣传员符合条件的应予保留,不合条件的一般应转入群众性的宣传组织,个别成份不纯的应加以洗刷。”^[41]经由上述工作,中共在短时间内建成了一支逾百万且具备基本工作能力的宣传大军。

三、组织领导:宣传网的运行

中共依托组织力量,不仅迅速建立起宏大的宣传员队伍,而且还实现了宣传网的常态化运行。建立宣传员制度和实行精神激励,是中共推动宣传网有效运转的主要方式。

中共在领导宣传网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在当时看来颇具开拓性的方式,即制度化的领导方式。尽管中共于正式成立时,便以“纲领”“决议”的形式,对宣传工作作出了制度性要求。此后,又不断以颁布制度的形式,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抓手。但

从制度推广的范围和深度上看,宣传网建设中有关领导制度的认识和实践,在中共宣传工作史上堪称空前。早在1950年9月末,东北地区的部分国营企业就已经开始试验建立宣传员制度。齐齐哈尔市“在二十四个较大国营工厂中,有十三个工厂建立宣传鼓动委员会,有一百七十八名宣传员,初步的规定了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度”^[42]。《决定》颁布后,宣传员制度建设随着实践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在全国性宣传网建设初期,宣传员制度建设内容具体包括党委领导制度、培养教育制度、模范评比制度及材料供给制度等几大方面^[43]。宣传员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使党的宣传工作由一种“临时性”工作转变为“经常性”工作^[44]。因此,各地在制定宣传员制度的过程中,多以“每月”“采用固定时间”“二月必开一次”等形式,明确规定了宣传员会议的召开频率。

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地多在短时间内便建立了宣传工作制度,但起初制度设计同实际操作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南苑区反映:“绝大多数村没有坚持会议、汇报、学习制度。虽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宣传员在各种运动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些作用是自发的活动时,存在严重的各干各的现象。”^[45]针对这一问题,各地党委除了强调要认真遵循原有工作制度外,又进一步对宣传员制度作出了细化,即建立了专责制度。如华东区“确定宣传员的分工,使每个宣传员都有固定的宣传对象与宣传阵地”^[46]。山东省则“根据地区、车间、生产小组指定固定的对象,分配宣传员的工作”^[47]。此外,还有地区通过建立宣传卡片制、工作日记等制度,推动宣传员

认真执行工作^[48]。

制度犹如整个宣传网的骨骼,在整个宣传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要实现宣传网的持续运转,使广大宣传员积极主动地投身宣传工作,还必须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构建起与之相搭配的激励机制。在物质十分匮乏的20世纪50年代,担任宣传员对于那些爱好写字、画图,但又苦于没有书写材料的人们,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如工人宣传员高占祥表示:“纸、笔、颜色都不用花钱,这种习字练画的机会哪里找呀!”^[49]但物质激励并非中共调动宣传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做法。担任宣传员完全是一种义务性的工作,仅少部分模范宣传员能获得一定物质奖励,且奖品多为各类宣传材料(详见表2)。精神奖励是中共激发宣传员工作热情的首要方式,即通过教育指导、登报表扬与模范评比等方式,使宣传员感受到承担好这份事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在各种激励方式中,中共最看重模范评比的方法。模范宣传员评比每年举行一次,先在支部一级进行。随后支部模范宣传员将被推荐至区一级,参与区模范宣传员的竞评。表现突出的区模范宣传员,将有机会参加市、省及国家级劳动模范的评比。各地制定的模范宣传员参评标准,多会同本单位中心工作相结合,并稍高于担任宣传员的基本条件。如贵阳电厂规定评比模范宣传员的条件包括:“1.政治鼓动与生产鼓动结合较好;2.工作积极、持久,并能深入群众;3.在宣传鼓动工作中累积的经验和找到的‘窍门’较多。”^[51]支部在评比模范宣传员时,第一

表2 北京市工矿企业优秀宣传员名单及奖品^[50]

姓名	性别	单位	奖品
樊玉良	男	北京铁路分局南口公务段	收音机一台(价值五十至八十元)。
王国祥	男	人民印刷厂	面粉两袋,蓝布五丈,毛巾一打,箴子半打,花布两丈,茶叶一斤(四万多),共产主义讲话,订“说说唱唱”一年,东北区宣传网工作经验,宣传员工作经验。
何鸿禄	男	长辛店铁路工厂	自来水笔一枝(五万左右),木加规一件(三四元),笔记本两个(一万左右一个),订说说唱唱一年(约二元),毛巾两条。

步将向全体宣传员说明评比条件；随后由宣传员互相按条件检查工作；最后由支部综合小组意见提出候选人，再交宣传员大会讨论，确定最终人选。部分支部讨论模范宣传员的过程十分激烈，各宣传员会逐一进行比较。例如在北京豆各庄的模范宣传员评比会上，起初大家认为一直担任村长的双奎全工作认真且在群众中十分有威信。但当考虑到模范宣传员应在生产方面作出表率后，便发现双奎全不如佟德禄。“开始大家认为他够格，但和佟德禄一比较，他不行。佟德禄领导的互助组是模范互助组。”^[52]宣传员在互相比、讨论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为明年如何改进宣传工作提供切实指导。区级以上的模范宣传员评比会议要更加规范，在开会前要首先制定会议计划，并向各村发出邀请函。如北京市南苑区1953年模范宣传员会议计划，分为会议主旨、参会人员及具体议程三大方面。当选的区模范宣传员，将公开向与会者传授工作经验^[53]。中共通过模范评比、张榜公示及公开讨论等方式，成功使宣传员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称号”^[54]。这既有助于树立宣传员的威信，同时也能够激励宣传员自觉投身工作之中。

四、组织配合：宣传网的扩容

中共中央在《决定》中，已经考虑到宣传员要积极同党、政、军、民及文艺界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宣传工作。但当时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针对部分党组织十分薄弱的新解放区^[55]。因此，各地在开始筹建宣传网时，多将精力集中于建设“党的宣传网”，非党宣传网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情况在1951年3月中下旬出现了变化。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要求“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56]。在此指示下，各地就抗美援朝运动普及情况，展开了深入调查，并发现了宣传工作存在大量“空白点”的突出问题。如“长春县的一个中等村——孢子沟村，有80%的人没有受到教育。从各地的典型调查中也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教育还进行得差。磐石县太平区一个

上等村——锅盔村大部分妇女不知道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十七个人中只有两个人知道‘朝鲜是中国的大门，美国鬼子来了没有我们的好’，许多老年人表示，‘快死的人啦！国家事知道不知道没啥用’”^[57]。在庄河县徐岭村，“农民庚明学说：‘抗美援朝就是大生产呗！’还有些人光记了些名词，不知道内容”^[58]。这些“空白点”集中暴露了宣传网存在的缺陷。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宣传网主要建立在党、团组织基础之上，像家庭妇女、老人等游离于党、团组织的群体，便很难接受宣传。如沈阳市和平区区委宣传部对本区一个居民组的调查显示：“过去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是注重了有组织的群众，和群众中的基层干部，而忽视了在几乎占全区人口半数的无组织的群众中宣传（如家庭妇女、三轮车夫、小摊贩）。我们对宣传工作收获的估计，也往往是根据这些有组织的干部群众为准则，因而，也就容易满足在这一少部分人的认识上。”^[59]北京市关于小红门村的调研显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最受教育的是男的，其次是8到16岁儿童，再其次是老年人及妇女”^[60]。即受宣传效果同群体的组织程度是呈正相关的。然而在多数地区，组织外的群众反而占总人口的多数。

第二，面对大量的基层民众，仅凭宣传员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做到全面普及。尽管依靠党、团组织，中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了数百万宣传员，但在媒介不畅，只能将口耳相传作为主要宣传方式的条件下，宣传力量仍是杯水车薪。据北京市统计，截至1951年底，“城市九个区（包括中、小工厂，中、小学校，机关和街道支部在内）共有宣传员2919人，占城区人口百分之2%；郊区七个区共有宣传员1372人，占郊区人口的0.19%”^[61]。这意味着每名宣传员至少要承担向50人做宣传工作的工作量。而在沈阳南一经路的9名宣传员，更是要向1870多户人家共8500多人做宣传工作。宣传员感慨：“单靠一个宣传员的能力打算使一百五十户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那是不可能的。”^[62]因宣传员人数少而无法完成宣传任务的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截至1951年4月，在宣传员规模相对较大的黑龙江省，宣传员人数占当地人口总数的0.72%，

而上海更是仅为0.0022%^[63]。

发现存在大量“空白点”后,中共立即作出了反应,采取的主要方式为加强宣传员组织和群众组织的配合,通过进一步扩大宣传力量,扩展宣传工作的覆盖域。在基层党委和宣传员的共同发动下,中共迅速组建了一支规模更为宏大的宣传队伍。如哈尔滨市在制定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计划后,“各机关、工厂、团体、学校均制定了具体计划,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党的宣传员3551人(连原有的宣传员在内),组成临时宣传队10026人,市区干部组成报告员267人”^[64]。北京市城内9个区则“前后动员了18292个群众积极分子来参加宣传工作,动员得最多的一个区,第七区有3100人,最少的一个区,第二区,亦达到1348人”^[65]。群众组织的加入,极大扩充了中共的宣传力量。以北京机器厂第二分厂为例,1951年5月时,该厂宣传员人数占职工总数的4%,若算上宣传鼓动组组长,则宣传工作者占职工总数的百分比,将大幅上升至接近25%^[66]。

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支更为庞大的宣传队伍后,一个新的挑战又摆在了中共面前,便是如何组织、管理好这支队伍,进而充分发挥其宣传效力。一般情况下,组织规模越大,对管控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越高。中共在领导这支由报告员、宣传员及临时宣传员构成的宣传大军时,主要采取了分工负责制。然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粗线条的分工管理,中共在建设宣传网的过程中,将精细化的分工负责做到了极致。首先,中共为了使报告员、宣传员与临时宣传员能够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协调配合开展工作,明确了三者间的领导方式与主要责任。其中报告员主要由各级党政机关具有党员身份的负责人担任,定期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思想向群众做报告,并参与宣传员培训工作。报告员是一种更高级的宣传员,同时也是宣传员的领导者。宣传员主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临时宣传员则要在宣传员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向群众传达宣传内容及搜集舆情信息。中共中央中南局明确将它们之间的关系概括为:“报告员是它的思想上的指导者,党的宣传员则是团结广大非党宣传队伍的

核心,而非党宣传队伍则是党的宣传员的助手和后备军。”^[67]经上述组织安排,中共建立了以党组织为核心领导,经由“报告员——宣传员——临时宣传员”的链式信息传达结构。这一链式信息传达结构的特点表现在,各层级间有着明显的领导关系,层级越向下纵深,层级人数越多且越深入群众,下层级又能够将群众信息反馈给上层级,并为调整宣传工作计划提供参考。

其次,中共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宣传对象特点与宣传员专长,对宣传工作者进行了合理化分工。中共注重调查研究的政治传统,在宣传网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北京市十一区曾就面对不同群体,应如何选择宣传方式进行了深入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市镇及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黑板报、屋顶广播及公开讲座是较为理想的宣传方式。同时,面向政治觉悟偏低的普通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应先组织开展政治性的娱乐活动,然后再加以生动通俗的讲解;反之面对党团干部、积极分子进行宣传,则可以先进行讲座,其后再辅之以娱乐活动^[68]。再者,中共还要求各级党委根据宣传员、临时宣传员的专长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宣传工作。分工的具体方法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把各有专长的宣传工作者,安排至不同的宣传小组。如北京市机器厂第二分厂的宣传鼓动组下分“广播、读报、文字、美工、资料五个工作小组,宣传员在各工作小组内起骨干作用”^[69]。二是实行分区包干制。“比如有的区除将宣传员固定在一定地区外,并明确规定了派出所人员要将宣传员介绍给每一个组长和街道人民代表。居民组长要负责召集居民开会,并要保证一个人不漏,宣传员必须负责这个区域或组的宣传教育。”^[70]此外,还有地区使用了“对象包干”“个人包干一个居民小组”等分工方式^[71]。

最后,中共还领导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如沈阳市大东区委会“制定了宣传日报表,分发各有关单位,每三天汇报一次;并将该区按地域划分市郊、大东边门内、外与小东边门内、外三区,由该区区委会组织的三个工作组,经常负责督促,检查”^[72]。哈尔滨市的部分区则建立了签到制,“以期做到一个人不

漏”^{173]}。中共在原有宣传网的基础上,依靠群众组织,组建起更为庞大的宣传动员网络后,其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切实得到了增强。如锦州市超过98%的群众参与了抗美援朝运动投票工作,“除去少数疯子、傻子、重病者和外出行商及幼儿之外,其余全部都参加了。有些产妇、轻病患者,也都派人去床前讲解明白征求意见参加了举手”^{174]}。发动群众组织参与宣传工作的优势,一方面体现在宣传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使得中共在配置宣传资源时,显得更加自如。如中共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对于普通群众,开小会的效果要优于开大会。但过往囿于宣传员数量有限,各地只能以大会代替小会,从而导致宣传效果不佳。在组建起庞大的临时宣传队伍后,上述问题得到了解决。如北京市建立的临时宣传队,在工作中主要使用口头宣传、挨户访问和举行小型会议的方法。其中小型会议的种类高达8种,具体包括:座谈会、片儿会、晚会、联欢会、妈妈会、娃娃会、家长会、控诉会。为了便于群众参会,小型会议一般就设在居民的院里,“来开会的群众,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开会,地熟人熟,都大胆的讲话”^{175]}。这使得中共的宣传工作变得更加精细化,也更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中共依靠群众组织,真正使宣传工作延伸到了群众之中。群众组织“宣传的效果,却比学生和干部大”,“因为他们是和群众在一起的,懂得群众的思想情况,能够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传,而且是密切联系群众,学生和干部不能去的地方,不能接触的群众,他们都能够去,能接触到。大街小巷、深宅大院、家庭妇女、老太婆老头子,他们的足迹都能踏到,他们的宣传都能有效果”^{176]}。加上各类临时宣传员,中共直接掌握的宣传力量实现了倍增,这充分展现了中共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实现对这支庞大队伍的有效管理,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共精湛的组织技艺。

五、组织培育:宣传网的提升

宣传员的工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宣传网的运行效果。多数宣传员由于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又存在文化水平偏低、缺乏实际工作经

验等问题,他们刚承担宣传工作时,经常在工作内容及方法上暴露出一些缺陷。在吉林市,有的居民组长开展宣传工作时,用砖头砸人家玻璃,进行罚款,“另外有的宣传不得法,动员种痘时只会说:‘冬季种痘好’,群众思想搞不通,把孩子藏起来,委员就拉出孩子‘硬给他种上!’”^{177]}。宣传员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非但使党的宣传网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而且招致了群众对宣传员的不满。宁波永丰纱厂宣传员朱永仙就曾因宣传方式刻板,遭到了同事的挖苦。“像女工王杏仁,本来和朱永仙非常要好,如同姊妹一样,当她担任了宣传员以后,因为时常对她进行宣传教育,她不但不要听,并且说:‘你宣传宣传像‘老三’一样,这样讲讲,我也会讲’”^{178]}。能力上的不足,还进一步挫伤了宣传员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有的宣传员也不知道怎么样宣传;又怕宣传不好,光耽误活……所以非常苦闷。”^{179]}因此,中共中央很早便提出应把培育宣传员作为宣传网建设的重要一环^{180]}。

具体实践中,党支部承担了大部分培育工作。如北京市委宣传部强调:“支部要负起实际培养宣传员的任务,经常检查宣传员的政治、时事和文化学习,加强对宣传员的具体帮助。”^{181]}而市、区级党委则主要通过从各地抽调宣传员,进行集中轮训的方式,参与培育工作。各地为了持续提升宣传员的工作能力,还纷纷制定了宣传员培育制度。如本溪崔惠民宣传小组规定:“五天开一次宣传员小组会,学习宣传材料,研究解决困难、交流宣传经验。”^{182]}除此之外,针对农民文化水平偏低、农村缺少宣传材料及宣传任务繁重等突出问题,中共中央还专门提出在农村广泛建立宣传员传授站,并要求“指定专人(最好是区委和县委的委员或报告员)担任传授站的传授工作,要他们按时到站作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应该力求通俗,并应密切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183]},进而满足农村的宣传工作要求。

在培育方式方面,首先,会议讨论是各地提升宣传员工作能力的主要手段。不仅宣传员小组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会,大区、省、市、区等各级党委,也会按期举行宣传员会议。宣传员会议的议程,除了分析

与布置宣传任务外,主要围绕如何培育宣传员展开。会议主要采取发言讨论的方式,一方面让宣传员分享工作中总结的先进宣传经验,另一方面则讨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会议讨论对于工作能力相对较差、文化水平偏低的宣传员,具有明显的辅助作用。如在蛟河南岗村,“经常的会议制度和学习制度,使全村宣传员都养成了个好习惯。自己没底的问题决不胡乱宣传”,宣传员遇到不会的问题,就把“问题提到村上,经支书、村长一研究,做出了答案,农民一听,都明白了”^[84]。其次,举办训练班是各地提高宣传员工作能力的又一重要方式。中共中央曾在1951年底要求各地“举办训练班,将宣传员加以普遍的训练”^[85]。相比于会议讨论的培育形式,训练班有着更为规范的培育程序。在开班前,党委将确定培育对象及培训课程。训练班多为期一周左右,集中轮训暂时脱产的宣传员,培育对象主要针对宣传员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其培育效果也相对更好。最后,自学是宣传员提高自身工作水平的常用方式。在工作任务繁重、教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多数宣传员难以获得接受系统培训的机会,而阅读宣传资料与主动请教他人,成为他们改善宣传手段的主要方式。如鸡西煤矿宣传员杨春华为了改进宣传方式,“就每天翻看各地的报纸找别人的经验”。经过刻苦学习,他的宣传工作不仅获得了工友的认可,而且还推动了厂里的生产工作^[86]。

通过自学报刊提升工作能力,在宣传员群体中并非个案,而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在党组织的有力引导和大力支持下形成的。如中南局将分别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事手册》《宣传员》规定为宣传员必读书刊^[87]。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在为宣传员提供学习材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曾在《决定》中指出:“省、市、地方和县的党的委员会应当经常供给宣传员以宣传的指示和资料。各级党报和党刊应当经常发表讨论宣传工作和宣传员工作的文字。”^[88]在此指示下,各级党委均参与了宣传员资料的出版和供给工作。如在中央一级,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负责的《时事手册》,是当时国内销售量最大的期刊之一。

早在1950年,该期刊销售量便达到了124万余册,“创造了国内杂志销行数量的新纪录”^[89]。1951年初由东北局出版的《宣传员手册》的单期发行量已经超过十万份,而当时东北地区的宣传员总数为近十二万,其发行量接近宣传员人手一册^[90]。

《时事手册》《宣传员手册》等资料虽在发行量、影响力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也存在着缺乏地方特色、语言不够通俗等问题。一线宣传员曾反映:“《宣传员手册》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事实上《宣传员手册》也难以满足每一个厂矿农村的具体要求。”^[91]为此,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多为宣传员提供切合本地实际情况,且“文字通俗、一念就懂的宣传员讲话材料”^[92]。实践中,各地党委机关报成为供给宣传员学习材料的重要阵地。如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报》,就曾于1951年1月发表了24篇有关宣传员工作的报道^[93]。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时报》则长期开设《宣传员讲话材料》专栏。这些宣传材料为宣传员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模范宣传员张政发“常说:群众需要货(政策),当宣传员的就要到报上去‘办货’来‘卖’给群众”^[94]。

余 论

查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网建设工作的报道,可以发现:中央及各地在总结这项工作时,总是将宣传网建设的成效,归结为党委领导得是否有力。如《人民日报》指出:“从各地建立宣传网的工作看来,凡是党委重视与进行系统领导的地区,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就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反之,成绩就比较一般或不够显著。”^[95]类似论断充分说明了组织对于宣传工作的驱动作用。“组织驱动宣传”并不是简单地依托组织,迅速扩充宣传队伍,而是将中共的组织优势嵌入宣传工作,深度提升宣传工作质量。如中共在组织层面重视基层建设、长于调查研究、严格纪律要求、强调制度建设等政治传统,便能够增强宣传工作的延伸力、精准度、权威感和持续性。

在7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依托组织力量,建立起既能覆盖全国,又能深入社会的宣传网络,为新中国的宣传工作构建了良好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并牢牢掌握了舆论主导权。而中共通过组织驱动宣传工作的同时,组织自身也在持续发生新变化。首先,组织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宣传员在宣传群众前,先要系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再进行反复的宣传实践,这使得党、团员加深了对党的思想的认识与理解。其次,在宣传工作中表现出色的积极分子,被陆续发展为正式党、团员,组织队伍实现了良性发展。最后,组织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改善。“宣传工作加强后,确实‘使一部份党员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工作时容易醉心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而不是说服解释方法来对待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得以克服”^[96]。群众对干部作风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过去是蜜上沾辣椒,现在有礼气了。’”^[97]

中共中央在依靠组织力量建设全国性宣传网的

同时,也在重点发展更为专业化的宣传系统。以中央宣传部为例,7年时间里,该部已经从1949年3月的“内部无职能机构,干部20余人”,发展至1956年7月的“调整为9处1室编制增加到437名”^[98]。随着专业宣传组织的发展,宣传网的发展空间被不断挤压,甚至在执行部分宣传任务时,宣传网还同党政宣传机关发生了冲突^[99]。1956年6月,中宣部明确提出“现在没有网的,可以算了,但要建立也可以建立;已经有网的如果要取消,也可以取消”^[100]。尽管自1958年3月,宣传网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101],但上百万曾经担任过宣传员的基层干部及党员、团员,却依旧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且“宣传”已经成为他们领导人民认识与改造中国的重要武器。

[参考文献]

- [1]参见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杨丽萍.1949~1952年宣传员制度建设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唐海江,朱文文.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建设“宣传网”的历史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1,(4)等.
- [2][3]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58,116.
- [4]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朱至刚.试析建国初期宣传网的建立和撤销:以党的组织力量为考察背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1);赵勇.“宣传”和“组织”之间——政治系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校[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2);卢毅.民主革命时期国共宣传工作比较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6,(8);王明亮.国共宣传战中国国民党宣传何以失败:基于组织行为学的一种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0,(6)等.
-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05.
- [6]陈云文选(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6.
- [7]彭真文选[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4.
- [8]李庄.加强除奸反特工作[N].人民日报,1950-03-12.
- [9][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G].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6,147-148.
- [10][47]夏征农.夏征农文集(党的宣传工作)[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34-35.
- [1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48-449,440.
- [12][29]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282.
- [13]罗瑞卿.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J].新华月报,1951,(4).
- [14]《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021;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0[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18,619.
- [15]坚决粉碎反革命谣言 沈阳市公安局逮捕造谣犯 并在机器一厂、电工六厂开反谣大会[N].东北日报,1950-10-23.
- [16]九台县六间房村地主张树藩翻把杀人 已被人民法院判死刑[N].东北日报,1950-11-11.
- [17]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N].人民日报,1950-06-29.

- [18] 中央宣传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宣传的指示[J]. 宣教工作通, 1950, (26).
- [20][26][30][44][55][80][8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 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N]. 人民日报, 1951-01-03.
- [21] 于长钦. 我想通了! 记张鹏昆对时局态度的转变[N]. 东北日报, 1950-11-21.
- [22][40][57] 吉林省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〇——一九五一): 第2册[G]. 内部文件, 312, 318, 293.
- [23] 提高一步, 深入一步[N]. 东北日报, 1950-11-29.
- [25] 中央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 北京市团校共青团工作教研室, 辽宁省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 共青团工作学习参考资料(第一册)[G]. 内部文件, 112.
- [27] 西宣部关于建立宣传员制度问题的意见[J]. 党内通讯, 1950, (61).
- [28] 对目前宣传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研究[N]. 解放日报, 1951-03-16.
- [31] 热河省委根据中央决定 讨论加强宣传网 直属机关已确定报告员[N]. 东北日报, 1951-01-25.
- [32] 慈明德乡建立宣传网经验[N]. 宁波时报, 1951-02-21.
- [33] 李伦. 一年来各地设立宣传员的概况[N]. 人民日报, 1951-01-04.
- [34][36][83][85]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宣传员的队伍[N]. 人民日报, 1951-12-19.
- [35][美]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 等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8.
- [37][38] 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N]. 人民日报, 1953-01-03.
- [39][99][100] 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91, 159, 159.
- [41][46] 华东区试建宣传网的经验[J]. 华东新闻汇编, 1951, (4).
- [42] 齐市整理企业宣传网[N]. 东北日报, 1951-01-19.
- [43] 参见杨丽萍. 1949~1952年宣传员制度建设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3).
- [45] 南苑区委宣传部有关宣传工作的计划专题报告. 北京市档案馆: 036-001-00235.
- [48] 东北局宣传部及阜新县委 建立机关支部宣传员 利用业余时间向居民中进行宣传[N]. 东北日报, 1951-02-17.
- [49] 全市宣传工作会议文件. 北京市档案馆: 001-012-00223.
- [50] 模范奖励名单. 北京市档案馆: 258-001-00079.
- [51] 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宣传部. 怎样做好宣传鼓动工作[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52: 87.
- [52][81] 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市发展宣传网的情况. 北京市档案馆: 011-012-00096.
- [53] 南苑区委宣传部 1953 年工作计划通知宣传员调查统计表. 北京市档案馆: 036-001-00236.
- [54] 彭漪涟. 争取作宣传员的热潮在高五班[J]. 西南青年, 1951, (12).
- [56] 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N]. 人民日报, 1951-03-17.
- [58] 庄河县徐岭村 抗美援朝教育不深入 支部已决定经常教育的办法[N]. 辽东大众, 1951-05-30.
- [59] 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抽查[N]. 东北日报, 1951-04-15.
- [60] 北京市第十一区有关中苏友好、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及捐款情况通知等. 北京市档案馆: 036-001-00331.
- [61][65][66][69][75][76] 市委宣传部通知、计划等. 北京市档案馆: 040-002-00066.
- [62] 一个街普及抗美援朝教育的经验——沈市南区南八家子派出所所长崔连志讲、田青记录[N]. 东北日报, 1951-04-23.
- [63] 朱至刚. 试析建国初期宣传网的建立和撤销: 以党的组织力量为考察背景[J]. 现代传播, 2012, (11).
- [64] 哈尔滨部分街道已趋普及 运动发展不平衡亟待纠正 南岗区宣传员尚“按兵不动”, 某些机关干部迄今未参加宣传[N]. 东北日报, 1951-04-21.
- [67][87]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N]. 河南日报, 1951-02-02.
- [68] 北京市十一区委宣传员会议记录计划总结和动员情况. 北京市档案馆: 036-001-00231.
- [70][73] 周密布置后全面展开爱国教育 哈尔滨市“空白点”大为缩小 至廿五日止参加签名投票的市民已达卅一万[N]. 东北日报, 1951-04-27.

- [71][74]锦州市委宣传部.锦州市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总结[N].东北日报,1951-05-15.
- [72]沈阳市大东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 力量集中分工具体 消灭“空白”有成绩[N].东北日报,1951-04-23.
- [77]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市的街道宣传员工作[N].东北日报,1951-01-22.
- [78]周婵娟.永丰纱厂宣传员朱永仙 灵活运用宣传方式[N].宁波日报,1951-07-07.
- [79]纠正支部不领导的偏向 太平庄村整顿宣传组织[N].辽东大众,1951-02-03.
- [82]朱诚.本溪崔慧民宣传小组的宣传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 [N].东北日报,1951-01-23.
- [84]辰生.蛟河南岗村的宣传工作[N].东北日报,1951-01-22.
- [86]白天明.矿坑里的宣传员——杨春华[N].东北日报,1951-01-23.
- [89]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 一九五零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要点[N].人民日报,1951-05-12.
- [90]东北局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决定[N].东北日报,1951-02-15.
- [91][92]黎澍.宣传员需要怎样的武器? [N].人民日报,1951-01-19.
- [93]应当经常发表讨论宣传工作和宣传员工作的文字[N].东北日报,1951-02-25.
- [94]洪道源.不仅宣传还作样子 宣传员张政发的工作办法好[N].辽东大众,1951-04-05.
- [95]富振声.东北区建立宣传网的经验(一续)[N].人民日报,1951-03-15.
- [96]王坪.黑龙江省肇东县太平山村的宣传鼓动的故事[N].东北日报,1951-03-17.
- [97]周擎宇.宣传员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介绍河北大名县党的宣传网工作的作用和特点[N].人民日报,1951-03-15.
- [9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3.
- [101]王炎.新中国宣传网制度述论[D].首都师范大学,2003:166.

(责任编辑 宁 静)

Organization-Driven Propaganda: Rethin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aganda Network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I Zeyuan

Abstract: Relying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ce to promote propaganda work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nce faced with hug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li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driv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selection, work leadership, multi-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other ways, to quickly build a nationwide and highly permeabl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propaganda network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PC's strong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bility and exquisite propaganda management skills. In addition, while the CPC relies on it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to promote propaganda,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has also been updated and upgraded.

Key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paganda Network, Publicity Work, Organization- driven